

中国古代如何进行政德教育

鄧爱红



富，贯穿于学术研究、人生修养、治国实践等方面面，嵌入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在实践中，历朝历代通过家训教化、学校教育、公文诏书、谈话著述、官箴劝诫等形式，传播政德思想，对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作用。

家训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家训有十余万种。家训的内容涉及修身处世、为学为政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大量政德教育的内容。如，诸葛亮告诫子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认为要“以行为教”“以学为教”“以身为教”。他写的《颜氏家训》要求子女勤学、自律、重义。“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只会高谈阔论，否则就会浪费国家资财。

教育考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为学的目的在于成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担当治国平天下使命的君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汉唐以来，无论官学、私学，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国家选任官僚也以修习儒家经典所达水准为主要标准。正己修身、清廉为官、重义轻利等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的经典研读和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内化为了即将入仕者的君子人格。此外，历代帝王也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

式促使为官者时刻坚守政德。秦代的《为吏之道》中就包含了要求官吏忠诚、清廉、审慎、喜善、恭敬的内容。汉代察举科目中包含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其要义就是“公、能、智、勇”等道德标准。唐代吏部有考功司，以“德义”“清慎”“公平”“恪勤”所谓“四善”来考核从政为官道德。

公文诏书。西周时期，周公吸取商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修德配命”的观点。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修德性、行德政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帝王大臣往往将政德教化寓于传达政令的公文诏书中。汉唐以来，很多皇帝诏旨及政府文告中都包含阐述君民关系、以民为本等德治理念，评品官员道德品行等政德方面的内容。比如，汉文帝《匈奴和亲诏》：“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陈情表》极陈孝亲之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感动了晋武帝，也成为后世培养官员“孝”“忠”德性的教科书。唐太宗在《命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军事诏》中先肯定太子李治“忠孝成德，志业光茂”，而后才是任命的内容。

谈话著述。中国古代很多帝王重视德教，留下了大量教育官员修养政德的文字。《贞观政要》中有三分之一的篇章是记录唐太宗与大臣谈论政德的内容，既有对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正向品德的阐述，也针对奢纵、贪鄙等负向品德展开讨论。武则天专门著《臣规》一书，其中包括了至忠、

守道、公正、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政德内容。宋元璋以严厉反贪著名，他也并非不教而诛。为唤醒官吏的良心，他亲自编写《醒贪简要录》，令所有官吏熟读。《康熙政要·论君道》中记载，康熙曾言：“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教育官员慎微慎小。史学著作、文学作品等大众文化扬善抑恶，也是官吏政德学习的重要渠道。许多史学著作，如《春秋》《史记》通过点评历史事件和人物起到价值引导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声、民意、民心，具有匡正时俗的功能。屈原、范仲淹、苏轼等的作品也都具有政德教育功能。此外，中国特有的匾额和楹联也是传播政德的重要载体。上至皇宫，下至县衙的匾联，或申明施政宗旨，或以官箴劝勉，官员耳濡目染，受到教育。

官箴劝诫。“箴”，是规谏和告诫的意思。官箴最早是指官吏对帝王所进的箴言，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周武王时，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即要求文武百官用箴言以诫武王过失。唐朝以后，官箴逐渐演变为官吏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官箴多阐述官员修养和从政经验，虽内容因作者经历会有所侧重，但政德内容必含其中。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元代张养浩的《为政忠告》、清代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清代汪辉祖的《学治臆说》等著名的官箴中都有很多政德教育的内容。吕本中的《官箴》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张养浩在《为政忠告》阐述了包括从政自修、执政为民、为政清廉、施政有道、执政有节等政德思想。

王小波

六世纪中期拜占庭鼠疫及应对措施

公元6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内暴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鼠疫，造成的损失惨重，人口急剧下降，对帝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负面影响巨大。那个年代的人尚不知鼠疫为何物，通常都是以瘟疫一词来称呼这场大的灾难。根据史书记载的患者症状及现代医学的遗传DNA分析，学者们断定，这次瘟疫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鼠疫。

鼠疫的传播及导致的后果

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公元541年7月，这场鼠疫首先暴发于拜占庭帝国属地埃及尼罗河入海口处一个叫作培琉喜阿姆的地方，之后分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东先是传播到巴勒斯坦沿岸，后于542年春季4月份传播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此地暴发规模加剧。当年夏天，传播到叙利亚、安条克等地。向西于541年9月份传播到埃及首府亚历山大里亚城，542年秋季传播到西西里地区。543年传播到突尼斯、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等地区。其中，这场鼠疫在首都君士坦丁堡肆虐的时间较长，从542年4月一直持续到8月，这4个月的时间里3个月属于剧烈暴发、传染相当强烈的阶段。仔细考察发现，这次鼠疫的传播是沿着商业路线、海上航线进行的，后来传播到波斯，则是沿着军事路线进行的。亲身经历这场鼠疫的几位历史学家都对患者感染后的表现做了记录，大致相同的症状就是身体发烧，多处出现肿胀、发脓、溃烂，进一步发作后则会昏迷、精神错乱、翻滚奔扑和歇斯底里。在这场鼠疫中死亡的人

数，普罗柯比记述的是每天最高达到10000人，以弗所人约翰记述的是每天最高达到16000人。很多家庭、城市和村庄全部的人都死去，城外到处堆满了尸体，有的大坑埋葬几万具尸体。这场鼠疫导致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下降了一半，整个拜占庭帝国的死亡人口更是多到不可计数。以至于著名历史学家吉本把人口数量的明显减少看作是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一个极大污点，并认为一直到18世纪其负面影响仍未完全消除。

这场鼠疫造成的冲击远不止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一方面。政治上，帝国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受到冲击，反皇势力伺机而动，统治发生动摇。查士丁尼皇帝也感染了鼠疫，只是侥幸免于死。经济上，人口急剧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城市里的商业活动和手工业都停止了，粮食等物资匮乏，物价上涨了至少两三倍，通货膨胀无法阻止。农村的庄稼无人收割，谷物烂在地里，土地无人耕种，大片荒芜，国家税收大幅减少。军事上，拜占庭军队中将士感染鼠疫死亡者众多，兵力下降严重，直接影响到对阵波斯的前线，屡吃败仗，当波斯军队也感染鼠疫后，双方才被迫停战。除这些外，鼠疫还在精神层面给拜占庭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惧。面对无医可治、无药可救，国家也束手无策的局面，悲观绝望情绪在拜占庭人的



《死亡的胜利》是老彼得·布鲁盖尔于1562年左右绘制的一幅板面油画，作品描绘了一群骷髅大军过境的恐怖景象，隐喻了千年来肆虐欧洲的鼠疫。

拜占庭帝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国家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对措施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即事前预防、事中救济和事后追加。就事前预防而言，拜占庭帝

国政府对这次鼠疫的发生是没有预料的。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其一，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拜占庭人对鼠疫类传染病毫无认识，更不用说预防。医生们对此类传染病未曾开展过研究，尚无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鼠疫暴发时，医生们也曾尝试寻找病因，于是解剖病灶处，打开后发现里边是毒疮，但还是不知此病因何而起。其二，帝国政府的施政重点不在医疗事业，太多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在

范仲淹的儒官气质

沈小勇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比包拯年长十岁，同样是古代为官者的楷模，他为世人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范仲淹一生清正廉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历任地方和军政要职，也曾在朝中担任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从政三十余年，始终以匡世济国为己任，践行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王安石赞誉其为“名节无疵”，司马光称赞其为“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范仲淹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文武兼备，出将入相，传教和办事二者兼备，道德文章和大忠伟节一再为后人所称颂，足见其人格魅力所在，不愧为一代儒官。

自27岁考中进士后，范仲淹开始了漫长的入仕生涯。范仲淹曾到广德、泰州、楚州、苏州、杭州等多地为官，每到一处，他主要抓好四件事，即兴修水利、办学育人、保土安民、资政存史。他为官始终清正廉洁，忧国忧民，勤政为民。如他在泰州任职期间，当发现沿海一带海堤多年失修，导致百姓纷纷外逃，则提出了修复海堤的设想，在当时共调集了4万多人，长达4年的时间，终于修筑了一条150多里的海堤，造福了当地百姓，人们为了纪念范仲淹，将这条捍海堤称为“范公堤”。他在苏州任知州时，到任时正值苏州大水，灾民无数，民生堪忧，他便全力投入安顿灾民、兴修水利中。在杭州任知州期间，他为官清廉，体恤民情，以改善民生为己任，处事干净。曾有人建议他在西湖边造房以作颐养天年之用，但范仲淹断然拒绝，他直言指出，西湖乃天下之西湖，如与民争利占为私有，一旦去职后将如何为人。

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思想，与欧阳修等人一起，向皇帝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明确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主张，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先

导，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范仲淹独特的入仕经历，使他对民政和军政都相当熟悉，因而他的改革主张善于将治军之道与治国之道相融通，善于从百姓民生出发，勤政为民。

范仲淹在入仕期间，静以修身，俭以养廉，培养了一大批通儒。对于儒家济世情怀的追求，使他敢于犯颜直谏，因此常常获罪，多次被贬官。在范仲淹看来，“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儒者不可废道，他认为要做一个忠君之臣，首先就要做直言之士。正是因为范仲淹大胆直言的性格，也使得他留下了“五胆忠臣”的称号。

范仲淹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他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他这样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范仲淹的忧乐观，始终心系天下，克己奉公，从不把自己的升迁得失放在心上，而是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济世情怀。难怪大诗人元好问曾给予范仲淹这样的高度评价：“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范仲淹终年64岁，在他的临终遗表里，无一语谈及私事，有的还是对朝廷的忠贞不渝，对天下苍生的感念，他惟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佞倖，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这正是范仲淹一生忧乐天下的写照。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曾这么评价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凡人之情，已处其乐，不知人之忧，已处其忧，但见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正是这种理性之忧乐，正是这种儒家的忧患意识，成就了一代儒官范仲淹。

人物志

当时的应急能力非常有限，加上鼠疫的传播速度相当快，感染人数猛增，首都的行政管理體系感壓力不從心了。

就事后追加而言，查士丁尼政府痛定思痛，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这次鼠疫带来的损失惨重，无疑给拜占庭帝国狠狠地上了一课。鼠疫结束后，公元544年，查士丁尼颁布了一道敕令，即第112号新律，要求把各类商品的物价和人工工资恢复到鼠疫发生之前的水平，拒绝恢复的，处以三倍罚金收归国库。拒不执行这道敕令的官员，处以5倍罚金。拜占庭帝国政府同时认识到，之前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太少，帝国的医疗救助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在破坏力巨大的鼠疫面前，帝国内的医院不仅数量太少，而且设置简单，医疗设施缺乏。原有场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远远不够，无法应对鼠疫这来势凶猛的疫情。接受了教训，查士丁尼上台直到鼠疫暴发之后，开始重视医院的建设，政府先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等这次鼠疫灾害严重的城市修建新的医院，其中君士坦丁堡的医院多是建在海边一带，安条克的医院多是建在郊区，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也都加强了医院的建设。政府还为这些医院配备了较多的床位，医护人员的数量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医生们开始常驻医院。在查士丁尼皇帝的重视之下，拜占庭帝国的医疗救助事业得到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史话